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时空秩序

——以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为例

王 裔 婷¹ 李 禹 阶²

(1. 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2.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 时空观是文明的基本架构,与早期人类文明中的社会形态、人居模式都有着重要联系。随着近年来对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了密集且保存完好的汉魏时期古代人类聚居遗址。这些物化证据表明: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魏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先民正在历经“游居—半游居—一定游混居”的生活状态;族人的时空认知也从游猎社会的弥散性时间,逐渐转向农耕社会的循环性时间,并开始建立起天人合一的礼制序列和天道循环的时空观。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

关键词: 早期国家;汉魏聚落;人居模式;时空观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24)04-0114-11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40411

国家与人类文明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关注的重要课题。“国家”在考古学上通过多种物化标志而被识别和辨析,如多级聚落遗址、环壕城址和神庙、宫殿及青铜器等^[1]。而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社会组织的演变、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文化特征的多样化。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讲座中,基于大量考古发掘遗迹提出了辽西地区文明起源进程的想法,认为“古文化—古城—古国”是适合用于解释中国国家形成模式的^[2]。1994年,苏先生又在《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和《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中,阐述了“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和“北方草原续生型”的三个“中国”国家概念的发展阶段,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3]。

随着对黑龙江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了大量密集且保存完好的汉魏时期古代人类聚居遗址,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目前,对于三江平原的早期国家与文明的研究和探讨还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将基于七星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汉魏聚落遗址分布特征,从宏观的聚落遗址群到中观的中心城址两组空间层级,分别对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环境、人居模式及时空观念进行分析,深入研究这一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态与时空秩序,以增加对我国东北边疆地区早期国家社会形态的理解,

收稿日期: 2024-07-08

作者简介: 王裔婷(1985—),女,四川宜宾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传统聚落文化。

李禹阶(1953—),男,浙江绍兴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社会学及人类学。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巴渝传统聚落形态与民间信仰的关联及影响研究”(23YJC760121),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

增强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认同(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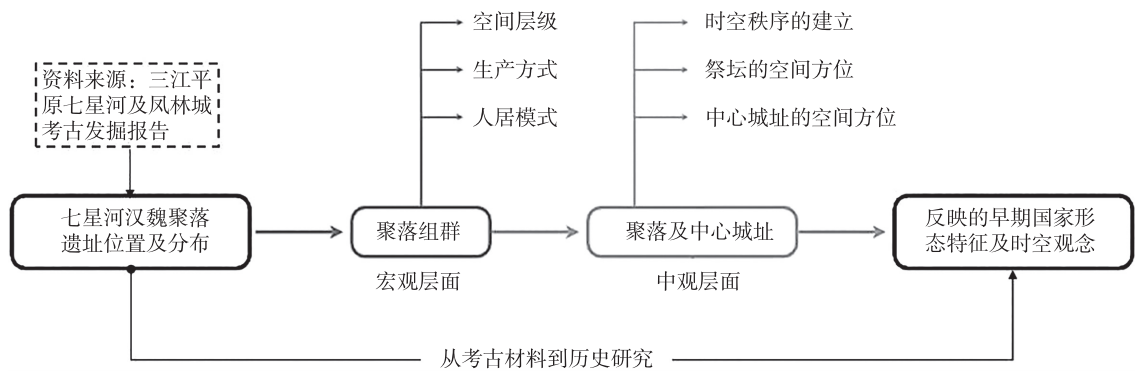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思路及框架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一、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概况

(一) 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分布特点

七星河位于黑龙江三江平原的腹地,全长 189 公里,流域总面积 3 985 平方公里,是乌苏里江左岸的二级支流。河流两岸地势平坦,中上游为低山、丘陵、高漫滩,中下游多低漫滩沼泽,河道狭窄弯曲(图2)。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移动文物目录·黑龙江卷》《中国文物地图集·黑龙江分册》等资料,考古发现的汉魏遗址共有 426 处,分布在七星河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这些遗址大小各异,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有成群分布也有零散布局。根据遗址的形制,可分为有城墙和城壕的“城址”113 处和无城墙城壕的“遗址”313 处。“城址”主要分布在山地与平原交接处,“遗址”多分布在平原中;依据城墙和城壕的数目将城址分为单垣城址、双垣城址、三垣城址和多垣城址。城址主要分布在七星河中游和上游,下游仅见遗址,且相同规模、相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遗址有成群分布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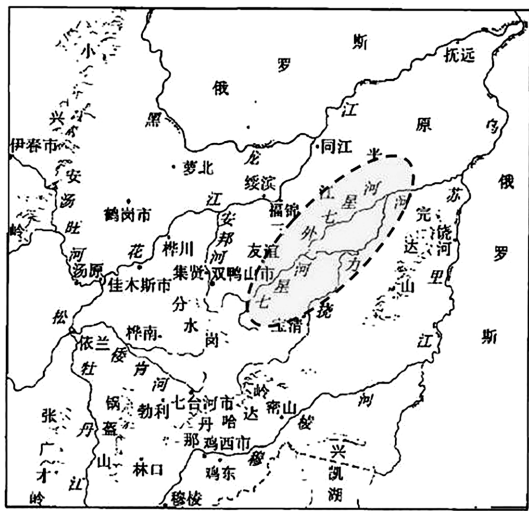


图2 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位置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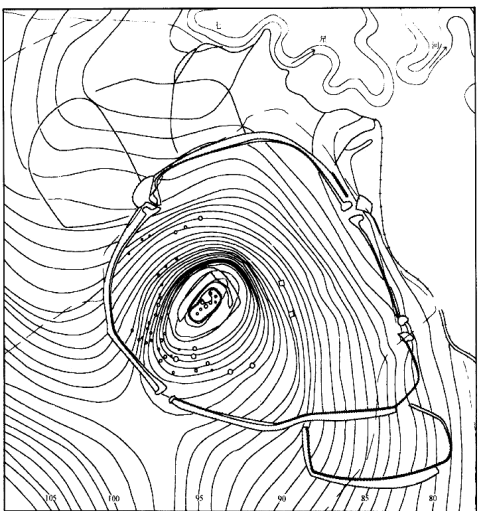


图3 七星河炮台山城址实测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4 页)

炮台山城址是七星河汉魏聚落中最大的山地城址(图3),对岸的友谊县凤林城址规模较大、地理位置特殊,是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的中心城址(图4)。两者是七星河流域仅有的3座多垣城址中的两座,它们一起构成了三江平原七星河汉魏遗址群中最为重要的聚落形态。在炮台山城址内的“北斗七星祭坛”,规模宏伟,位置居中,是目前东北亚已发现的最大的天文星座祭祀场所,兼具祭祀、防御和要塞功能^[4](图5)。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认为,炮台山古城是这一带最为重要的城址,“它的建制和规模具有国家的架势”^[5]。

按照史前中国从聚落组团(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趋势来看,不论在前国家时期类似“酋邦”的社会组织,还是在早期的国家形态构成中,国家机构的公共职能都需要通过祭祀、占卜来观天测象、预知节气和时令,并由祭祀、公职人员和军事领袖等构成阶级分层。如早在6000多年前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及其后的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规模较大的祭坛。这些祭坛不仅有着祭祀天地、神祇的意义,也有着观测天象、预知节气的功能。尤其是大型祭坛遗址,一般反映着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社会政治组织的演进,这种演进既可能是社会组织进入到高级酋邦阶段,也可能是进入到早期国家阶段。在炮台山城址内发现的“北斗七星祭坛”,其规模、功能及周边布局均超出了通常所说的史前社会酋邦阶段,属于由高级酋邦向早期国家过渡的时期。这种特征表明早在汉魏时期,我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已开始了由高级别的酋邦向早期国家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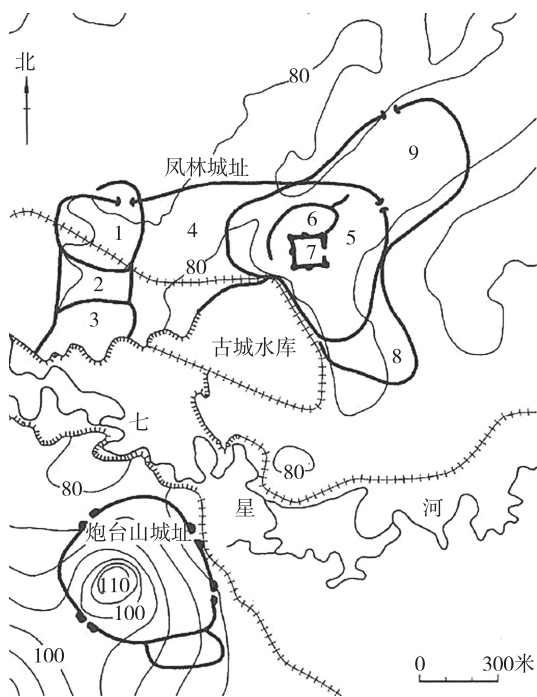


图4 凤林城址1~9城区与炮台山城址位置图

(资料来源:赵永军、田禾、张伟等:《黑龙江友谊凤林城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图5 炮台山北斗七星祭台实测图

(资料来源:伊世同:《东北三江平原汉魏遗址天文考古》,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二) 遗址的功能属性及聚落组群特征

依照功能划分,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分为居住址(313处)、防御址(83处)、祭祀址(8处)、要塞址(18处)和瞭望址(4处)五种类型。从遗址数量和类型可以看出,居住址和防御址是当时聚落组团的主要功能,祭祀址、要塞址和瞭望址的数量明显偏少,有聚落组团间共享的倾向,这从侧面反映出不同聚落组团间可能存在结盟关系^{[6]255-263}。

根据聚落遗址所依赖的水系和依托的山岗,将流域内 426 处汉魏遗址分为 16 个聚落群。其中每个聚落群都有一个中心聚落(图 6~图 7),共包含了 260 处遗址,占全流域遗址总数的 61%(一些分布零散或地处边缘的遗址暂未纳入)。上游和中游的遗址群包含了各种不同功能的遗址,而下游的遗址群则全部由居住址组成,要塞址、瞭望址和祭祀址只出现在遗址群较为集中的中游地区(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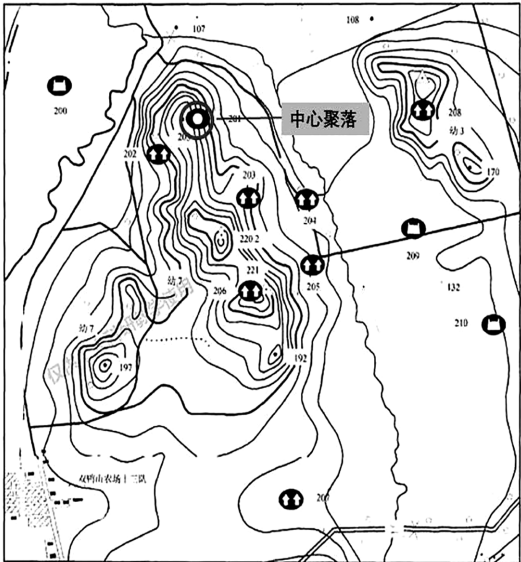


图 6 老方山遗址群分布图

(作者根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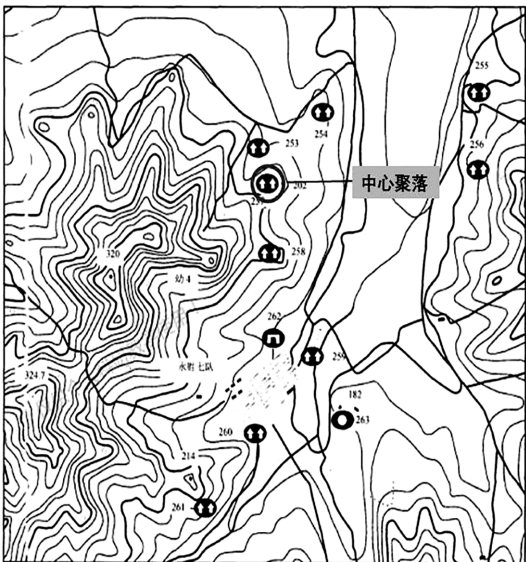


图 7 永利遗址群分布图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9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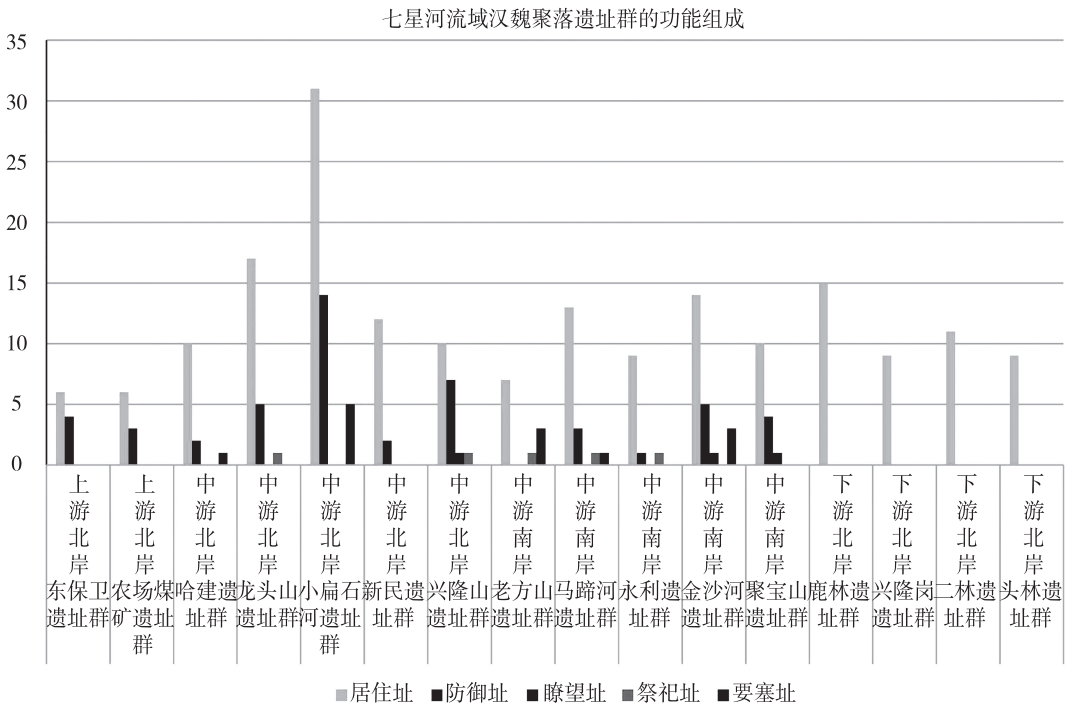


图 8 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的功能组成

(作者根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整理自绘)

其中,8 个祭祀址均为山地城址,出现在各个聚落的中心位置或全流域的中心位置,山形陡峭,上下

交通不便,属于各个聚落或全流域共同拥有,每个祭祀址所在的山体大小、台阶数量等建造规格上存在差别,反映了各祭祀址的地位等级。最大的炮台山城址由三个连环的城垣自下而上围筑而成,中心为主城,两侧为耳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城址范围内曾采集到石球、石斧、铁镞等器物,城垣内有圜丘,四周自下而上有三层台阶和三段登台梯步,规格完整,极具规律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从衣食住行到穿鞋戴帽都有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也自然体现在祭坛建筑和城址的营造中。因此,不同功能的聚落遗址组群的规模大小、建造复杂程度,意味着汉魏时期,七星河流域的部分聚落在财富积累与军事实力的支持下,突破了原有的规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等结构,出现了等级分化。其规模层级反映了以“礼”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和观念,而礼乐文明既是华夏民族、国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正是早期中华文化的显著标志。它说明汉魏时期七星河流域的早期聚落群体已经超越一邦一族之界限,具有了更为广大的制度、礼乐的文化含义^[7]。

二、聚落遗址群所反映的早期国家特征

(一) 多层级的聚落空间形态——从无序零散到相对集中

七星河流域的 426 处汉魏聚落遗址,以及依据其空间分布所划分出的 16 处遗址群,文化性质相同,同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每个遗址群都依靠着山丘和河流,占据着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理区位,单个聚落遗址有着不同的功能属性,每个遗址的规模、形制和功能又都有差异。如防御址中有多重城垣、三重城垣、双重及单层城垣,在无防御址的聚落中又存在地表坑数量多寡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特征(图 9)。单层城垣由于防御功能较弱,主要对应于一些游居或半游居的零散小型聚落,出现在边缘地区或围绕在大型聚落的周边,以居住址和瞭望址居多,也有小型的防御址和要塞址;双重城垣的规模开始增大,防御性也逐渐增强,适应于固定居住和临时游居的聚落,汇聚了更多的遗址和地表坑数量,在某些规模较小或者比较边缘的聚落群中,双重城垣已经可以作为中心聚落的标志,作为防御居住址居多,兼有祭祀址;三重城垣及其“异形同构”的混合城垣数量不多,作为更为复杂和高级的空间形态,对应于最为重要的城址和祭祀场所,在聚落群中被判定为中心聚落所在地。不论是单层城垣还是多重城垣,都普遍呈现圆形和向心内聚的形态,这种从单一结构到复杂空间的环状向心式布局的特征,在从史前聚落发展到早期国家阶段的过程中都具有典型意义。

根据聚落规模,可以将这些遗址划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四个层级。依据现有的聚落考古理论,四级结构至少存在三个管理层级,社会形态较为复杂。这种层级化的分布特征,除了基于自然资源的条件逐渐形成,还与早期国家社会的组织结构进程相对应^{[8]502}。以中心城址(凤林城)和祭祀址(炮台山城址)为例,凤林城占地面积 120 多万平方米,土筑城墙周长约 6.13 公里,城外有双护城壕,已发现半地穴或居住址 40 座,灰坑 40 余个。2000 年又发现一座 666 平方米的半地穴大房址,地面坚实平整,是目前三江平原地区所发现的汉魏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多垣城址。炮台山祭祀址的三圈围垣周长共约 4 000 米,占地面积 60 万平方米,墙残高约 2 米,东、西、北面的城门址宽各 20 米,南侧有瓮门^[9]。在古代修筑这种巨大规模的建筑、城防和祭坛址,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表明当时已经出现能够调动全流域的行政管理机构,再加上属于全流域的要塞址和祭祀址的发现,表明全流域的战争和祭祀活动已经存在。七星河流域汉魏时期的社会伴随着战争,处在激烈的动荡演进之中,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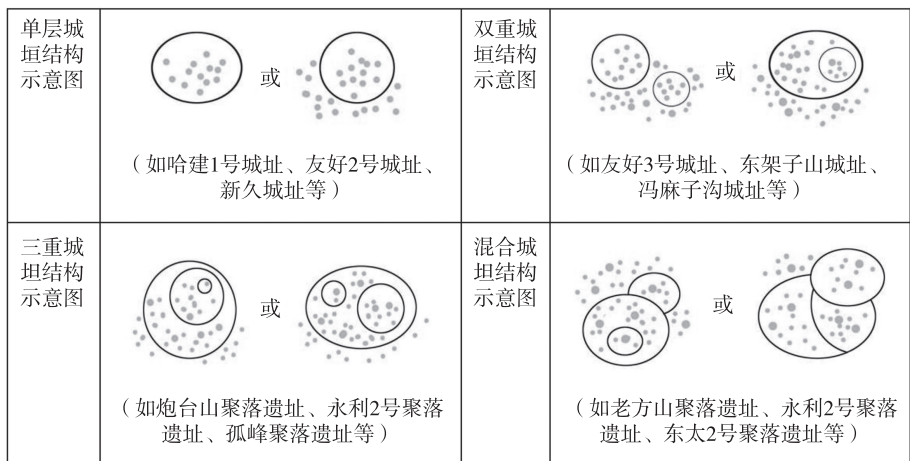


图9 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的空间形态构成类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整理自绘)

(二)七星河汉魏居民的生产方式——从林间游猎到半农半渔

通过对黑龙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认识可知,七星河流域汉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以滚兔岭文化为代表的遗存,与凤林文化是有前后承继关系的同一谱系考古学文化遗存。据考证,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与黑龙江地区的古肃慎族系活动区域多有重合。肃慎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原始民族,汉魏时期活动在这一地区的肃慎系族群为挹娄、勿吉^[10]。《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土地多山险。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以为穴居。”表明汉魏时期七星河流域各聚落内部有首领,且常活动在山林间。“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11],反映了挹娄的狩猎工具以弓箭为主,沿河居住于林间,以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12]。同时,通过对凤林城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可知,这里种植的农作物包括了粟、黍、大麦和大豆及田间杂草,表明这里曾存在一个短暂的相对繁荣的农业经济社会^[13]。在保安二号城址已发掘的属于凤林文化的房址中,曾发现一件完整、厚重的铁犁铧,表明当时集约化的犁耕农业已在七星河流域出现,农业生产技术也相对成熟。但这些发现主要集中在流域南部平原和半山地区,其他地区暂未发现此类工具,可能仍属于相对自由的游猎生产形态。

在七星河汉魏流域的426处聚落遗址的统计中,有166处零散或者地处边缘的聚落因为地形地势的原因,很难纳入到毗邻的遗址群中,形成了若干小型的临时聚落,约占总数的39%。这些遗址没有明确的领域界限和固定的房址以及防御措施,是以游猎为主要生计的小型聚落,随着渔猎资源的分布而随处迁徙。这反映了渔猎经济在当时的居民中是比较重要的生产方式,农耕生产并未完全覆盖全流域的聚落族群活动,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并不足以支撑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的全部人类生存。

(三)七星河汉魏居民的人居模式——从游居到定游混居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不同的人居模式。若仅从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游猎或者游耕是在特定自然环境中最为合理的生计方式。但从生活和管理的角度,定居似乎要比游居更合理。人类活动需要在生活、生产和生态之间寻找平衡^[14],而半游居则是一种由不稳定的迁徙带来的人居模式。因此,从以上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形态特征来看,随着生产方式的增加和混合,七星河汉魏先民的人居模式正在从“游居—半游居—分散定居—集中定居”逐渐过渡,体现了从早期的渔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反映了当时特殊的人地关系。先民通过灵活地选择居住模式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相适应,在礼制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的边疆地区,努力维持着人地关系的平衡。直到今天,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中依然存在着这种特殊的半游居模式^[15]。

七星河汉魏聚落的居住址及周边形态呈现出从单点到多点,从简单到复杂,从小到大,再到超大城址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一般而言,线形动态的零散空间是游居居民的空间开发原则,而静态的圆周式外围空间则是定居居民特有的空间开发原则,它们分别对应于渔猎采集活动和固定的农耕生产方式。如果说游居模式体现的是一种依附于自然的自由平等的关系,半游居和零散的定居模式着重体现的是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平衡关系,那么集中的定居模式则体现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建立^{[16]248}。筑墙的城址是贸易的安全场所,同时也是粮仓和手工业中心的所在地,这里居住着管理中心聚落的领主,与周边的游猎居民保持着共生关系,构成了汉魏时期东北边疆地区特殊的政治景观。此外,在许多较大聚落遗址的周围,还分布有很多零散的小型聚落,它们围绕中心聚落随环境而建,显示了强烈的内聚化倾向^{[8]504}。由于早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基本是依托血缘关系而组成的氏族、部落,因此,这里居住的可能是中心城址中贵族附属的氏族,为中心聚落提供劳动力与资源,在政治地位上有着明显的不平等关系^[17]。因此,可以判定,在汉魏时期七星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已经具有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

三、聚落遗址及中心城址所体现的时空秩序

作为最基本的群体表象,时空观是某种文化体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构成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特征的基本要素^[18]。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如日月、四时、年岁、方向、方位和时、空、宇、宙之类的术语,最初都指的是具体的意象,后来才演变成抽象概念,是一种概念与意象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的时空理论中,有三点最为突出:一是从统一的“道”来看时空的本质,并探求时空推移变化之“理”,具有很高的哲理性;二是从“物”的变化把握时空的标志和量度,注重阴阳消长和各种星象、物象的特征,具有明显客观性,并同天文、历法密切关联与结合;三是努力辩证地理解时空问题中的种种矛盾关系,如《墨经》中关于时间“久,无久”、空间的“有穷,无穷”和宇宙“有远近,无远近”的思想等^{[19]3}。

(一) 农耕社会的循环时空与游猎社会的弥散时空

根据前面分析可知,七星河汉魏先民的人居模式正在从“游居—半游居—分散定居—集中定居”逐渐过渡。从目前已有的民族学材料来看,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采用的纪年方式主要是草木和动物纪年,牧草青黄或鸟兽胎产都可以作为记年的标志。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提到北宋时期东北境内的女真族,“其人不知纪年。问之则曰:吾见草青几度,以草一青为一岁”^{[20]18}。尽管迄今尚未见这个时期肃慎族的历史文献记载,但秉承肃慎和女真属同一族系一脉相承的史学观点,汉魏时期的古肃慎族也应采用类似的原始纪年方式。从古肃慎先民的生活习俗来看,他们的时空观念也随着生业条件的变化逐渐发生着转变。早先的游猎(游居)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依赖于渔猎资源而非固定的土地,这些部落游荡辗转于不同的山林与流域空间中,不断拓展新的生存空间或往返于新旧居住场所,其生活空间的外围边界是不清晰、不稳定的。游猎的习俗决定了其空间是动态的、线性的,时间是弥散的,在游猎过程的不同时空转换中,宇宙的中点、日月起落可以随其迁徙,在任何居处观测,其方位点也是变化的。在这种生产方式和时空观念的作用下,新的聚落不断形成、涌现,没有清晰的空间边界,其居住和生产空间也随着游猎而不断转换、扩大。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弥散结合在一起,在创世神话助推下将时空不断地拉回原点,历时性被平铺到空间性当中,成为弥散混沌的时间经验,形成古代游猎民族弥散而自由的时空观。

早期的农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早期农业的节气、分至,需要有循环性的时间作为辨析

春耕秋收的季节周期。他们植根于固定的土地,为关注农时而设计出精巧的节令时间,如此循环往复。在这种文明中,祖先崇拜、城址边界、定居的形式、记录历史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定居耕作的生活方式从循环的时间序列中获得了合理性。因此,早期国家及其宗教组织通过掌握划分时间规则的权力,继而为王朝(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将其作为公共职能的重要一环。我国古代的时空观往往用来解释天下的循环往复与分合兴衰,它既是一种农业节气、天文气象的科学观念,也是一种蕴含在早期宗教里的“天人合一”的天道循环时空系统。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述早期国家的政治功能,其一重要职能便是确定方位、节气、天文、气象,“盖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幽远,非有神圣之德者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万物,定四时,成岁功,乃君相职业一大事……然太皞、炎帝、少皞、颛顼所历者四时。……至帝尧时,则占中星之法、置闰余之法渐已著明,然其命官,犹以羲、和为第一义。”^{[21]435}表明早期中国王朝的政治功能,已经包括了建立历时性和循环性的时间序列。而建立这种时间序列,恰恰是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公共职能。同时,在古代国家的诸多宗教祭祀活动中也包含了建立这样的时空序列,统治者也正是通过建构时间序列从而获得划分空间权力的合理性和至上性。

(二) 北斗七星祭坛与凤林城址反映的时空观

七星河汉魏遗址中具有明显正方位布局的构筑物是炮台山城址内的“北斗七星祭坛”。它位于中心城址凤林城南面正对的山头,与宫殿区的直线距离约1500米,常被纳入凤林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全流域最大的祭祀址,北斗七星祭坛与凤林城遥相呼应,敬天法祖,对应关系明确(图3),史称“巴如古苏霍通”(意为对面城),体现了“王宫居北,祀天位南”的北主政、南祭祀的礼制传统。与王城的合建,体现了北斗七星祭坛在整个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中的重要性,表明当时的祭祀仪式已经具有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宗教与政治意义。

祭坛顶层平面呈椭圆形,有8处“天坑”,其中7处按“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另一处位于北斗七星的北侧,经天文考古证实,为指向当年的“极星”位置,中央有一长方形圆角祭台,是东北亚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天文星座祭祀场所^[9]。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些遗址群中,显示出正方位布局的城址只出现在以上极少数的重要空间(中心聚落的中心城址)中,其他绝大多数聚落遗址仍是不规则的零散形态,也没有固定明确的朝向。属于全流域的大规模祭祀址也只有炮台山一个,在其余的祭祀址中也并没有发现特别的空间形制和天文关系,说明当时尚未形成普遍的空间方位和时间秩序,只在流域中心聚落的资源密集区域有开始出现的迹象。

对于星辰的信仰,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原始信仰之一,中国古人对北斗最为尊崇。司马迁《史记·律书》云:“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北斗七星祭坛既有着测度天象、节气的作用,也有着政治上以“天命”作为早期国家本体保障的意义。它说明汉魏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族群,已有了对天文星象的观测技能以及对方位崇敬关系的意识。冯时先生曾谈道,“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广泛存在北斗的遗迹,反映了当时人类普遍进行的北斗观测和对它的祭祀活动,这是先民重视北斗建时的体现。”^{[22]98}《宋史·乐志》中载有“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即是说的以斗辨时。授时与指方向,是通过北斗规定时间和空间的两大重要作用。凤林城的管理者通过观测北斗七星以建时建制,以王者的权力决定时间和时令,决定物候的时序,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时空认知体系,在天道和人道的同构互动中彰显着王权的神圣^[23]。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上,通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曾经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巫觋通过掌握或独占沟通手段传达天神旨意,构成王权神授的文化传统^{[24]13}。从依靠巫觋和玉器沟通的神秘天人关系,到转向观测北斗运行认知天地,建时建制,用天文历法管理社会生产和生活“敬授民时”,将神秘不可知的、只由少数人(巫觋兼王者)掌握的天象历法融于人间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

使天道与人道有了共同的目的,开始有了天象与人文同构的文明观念,也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程度已跨入文明的门槛。

在整个流域中“择中而立”的风林古城,则显示了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功能。它位于七星河整个流域聚落的核心位置,与南面的炮台山城址隔河相对,由三重混合城垣构成,外有深沟城壕,内有柱网整齐的大型宫殿房址,中心为方城,总体呈不规则形。城内被城墙分隔为九个城区,其中第七城区位于城址中心,平面呈正方形,具有居住址、防御址、要塞址等多种功能,带有角楼、马面等防御设施,是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城址^[25]。这种外郭内城的形态组合具有中国古代早期王城和宫城的形制特点,在战国及其后的文献中对这种“两城制”均有所记载,如《管子·度地》中的“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吴越春秋》中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等^[26]。该城址方位为正南北向,宫殿区入口朝东。《说文解字》中对东方的解释有:“东者,动也。从日在木中。”^{[27]121} 日即太阳,木指若木。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日出于旻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28]57},表明在对空间方位的认知方面,古代先民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并将方位意识运用到了重要建筑物中。

结 语

林沅先生曾在《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应在比较不同的案例时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29]。因此,本文试图借助考古材料,将中国古代的传统时空观念放到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理论框架下,对东北边疆地区古代族群的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及人居模式给予阐释,从族群的思想观念上进一步印证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居民已经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农耕工具、农作物遗存、大型城址和祭坛,说明当时的七星河流域已有了基于定居的农耕经济,而遗址的空间形态由单纯适应生产生活开始转向礼制意义,意味着这里的先民接受了这样一套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时空观,在社会政治组织上具有了融早期宗教与天文科学为一体的权力体现形式;也表明七星河汉魏居民在进入农耕定居生活时,建立了对宇宙的天道循环时空认知,结束了在游猎聚落时代弥散性的时间概念,开始在固定的定居地修筑都城和祭坛,建立起与中原王朝基本相同的时空架构。这种天道与人道互动的带有早期宗教性质的生产与政治结合的运行法则,为七星河流域的汉魏聚落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使得这里的上百处遗址形成了从分散到统一,从单一到复合的聚落层级,促成了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继而形成以血缘姻亲关系和族权政治为纽带的“家族—宗族—氏族”社会群体,开启属于风林古国的统治时代(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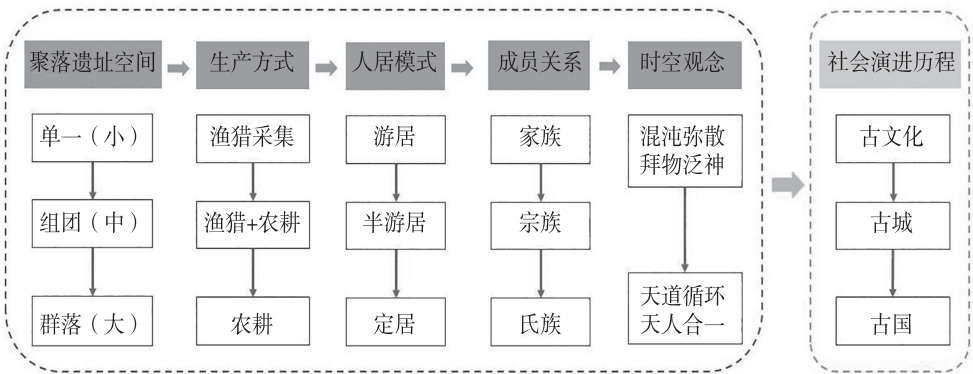


图 10 七星河汉魏聚落的早期国家演进模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早期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由于其生态环境原因,都有着对于未知时空的敬畏。正是这种敬畏,形成了古代中国普遍性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它既包含了自然秩序,也包括社会秩序;既包含城市、建筑等可见之物的建造、规划的物化规则,也包含了存在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中无形的礼制和等级观念。这种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秩序与一种无形的“天道”联系起来的,是中国古人时空观中特有的传统文化基因。这种无形的思想,在七星河汉魏聚落遗址中以物化形式呈现,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早期国家文明特质。

[参 考 文 献]

- [1] 让·弗朗索瓦·米拉尔,郭璐莎,陈淳. 秘鲁北部沿海维鲁河谷原始国家的形成[J]. 南方文物,2018(03):256-259,255.
- [2]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3] 朱乃诚. 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J]. 文物春秋,2020(02):3-10+31.
- [4] 赵永军,田禾,张伟,等. 黑龙江友谊凤林城址 2000 年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2013(04):539-575+583-596.
- [5] 张碧波,庄鸿雁. 三江平原古城古国文明探考[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01):96-103.
- [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7] 李禹阶. 早期中华文明特质的构成与演进[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06):34-39.
- [8] 许永杰. 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M]//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 [9] 伊世同. 东北三江平原汉魏时期遗址群的天文考古[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02):99-105.
- [10] 张伟,田禾. 挹娄、勿吉文化的考古学考察:以滚兔岭文化与凤林文化为中心[J]. 北方文物,2017(03):45-47+63.
- [11]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 [12] 段红云,王琦.《后汉书·东夷列传》与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述论[J]. 思想战线,2017(02):61-66.
- [13] 赵志军. 汉魏时期三江平原农业生产的考古证据:黑龙江友谊凤林古城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及分析[J]. 北方文物,2021(01):68-81.
- [14] 王俊敏. 从游居到定居、再到城镇化:鄂伦春族发展问题的生态—经济人类学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04):50-53.
- [15] 刘文卿,刘大平. 景观考古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组织信息阐释:以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为例[J]. 建筑学报,2019(11):83-90.
- [16] 埃尔曼·塞维斯.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M]. 龚辛,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17] 李禹阶. 文明与早期中国文明[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01):22-27.
- [18] 李宪堂. 中国传统时空观及其文化意蕴[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1(03):7-9.
- [19] 刘文英. 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 [20]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21]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2] 冯时. 中国天文考古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23] 张碧波,庄鸿雁. 三江平原古城古国文明探考[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01):96-103.
- [24] 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25]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凤林城:1998~2000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 [26] 徐昭峰,李云. 试论夏商周都城宫城及其相关问题[J]. 中原文化研究,2018(06):30-35.
- [27]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28] 刘安. 淮南子 [M]. 陈广忠,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9] 林沄. 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J]. 中原文化研究, 2016(02): 5-12+2.

State Morphology and Spatio-Temporal Order in Early Ancient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Han and Wei Settlements in Qixinghe

Wang Yiting¹ Li Yujie²

(1. School of Fine Ar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i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ivilizati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form and human settlement mode in early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Qixing River Basin in the Sanjiang Plain in recent years, dense and well-preserved ancient human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se physical and chemical evidence show that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 living in the Qixing River Basin of the Sanjiang Plain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China was going through a state of life from “nomadic dwelling-semi-nomadic dwelling-fixed wandering mixed dwelling”, and the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of the tribesmen also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diffuse time of the nomadic society to the cyclical time of the agrarian society, and began to establish the ritual sequence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time-space view of the cycle of heaven and earth. In some area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early state also emerged.

Keywords: early states; Han and Wei settlements; human settlements; space-time view

[责任编辑: 刘力]